摇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中国研究(2005 年秋季卷总第 2 期)/周晓虹,谢曙光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摇ISBN 7 -

摇 Ⅰ. 中…**摇** Ⅱ. ①周…②谢…**摇** Ⅲ. 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Ⅳ. **摇摇**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摇摇摇**号

中国研究(2005 年秋季卷总第 2 期)

主**摇摇**编 / 周晓虹**摇**谢曙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摇摇**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摇摇**址 / http: //www. ssap. com. cn
网站支持 / (010)6526996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65597353
电子信箱 / shekebu@ ssap. cn
项目经理 / 王**摇**绯
责任编辑 / 宋培军
责任校对 / 咏**摇**湖
责任印制 / 同**摇**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摇**65139963
经**摇摇**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摇摇**版 / 名人时代
印**摇摇**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摇摇**本 / 787 × 1092 毫米**摇摇摇**1/16 开
印**摇摇**张 / 14. 5
字**摇摇**数 / 246 千字
版**摇摇**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摇摇**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摇摇**号 / ISBN 7**摇**
定**摇摇**价 / 25.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摇**翻印必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 ertongbook. com

主编寄语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是1949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1978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19、20和21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等，都既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

（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5 月

中国城市精英与收入差异：1988～1995[*1]

边燕杰摇张展新[**2]

摘摇要：城市精英和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是反映中国新社会经济秩序的窗口。我们综合了研究文献，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不同的精英在经济部门的制度环境下寻求他们的物质利益出发，通过对1988年和1995年中国城市的全国性调查进行动态分析发现政治精英、事业管理精英的收入水平始终高于专业精英，但这主要限于由国家经营的垄断部门。处于开放部门的经理们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在部门内部，他们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尽管在1988年和1995年前者的收入水平略高于后者，但是前者的收入还是有所降低。在1995年，垄断部门所有的精英群体在收入水平上都高于开放部门的精英，但在1988年情况却并非如此。

关键词：城市精英摇收入差异摇社会阶层摇职业流动

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城市精英和他们的物质回报已经成为社会阶层理论的核心。吉拉斯（Djilas，1975）和泽林尼（Szelényi，1978：63－87；1983）的早期研究引发了对共产主义体制下“社会主义再分配精英”的兴趣。最近的研究考察了为什么政治精英追求市场机遇（Nee & Lian，1994：253－256）？政治精英和专业化精英怎样遵循着不同的职业流动路径（Walder，1995：309－328；Walder，Li & Treiman，2000：191－209）？在改

* 本文的资料分析得到了以下资助：香港大学资助局三项基金（HKUST6052/98H，HKUST6007/ 00H，HKUST6007/01H）和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项目资助。

** 边燕杰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sobian@ ust. edu. hk）；张展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为英文，译者施敏，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译稿中的统计学图表部分曾请刘安先生校阅，译者深表感谢。

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中，新兴的企业精英对社会阶层结构意味着什么（Pearson，1997；Eyal，Szelényi & Townsley，1998：221－253；Wank，1999；So，2001）？依据两次对中国城市的全国性调查获得的可比性数据，本文研究了从1988～1995年政治精英和专业化精英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化。

在过去的20年里，尤其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阶层结构和收入分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见边燕杰2002年的一篇评论）。从毛泽东思想中的平等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去层化”方针（Parish，1981：37－53，1984：84－120；Whyte & Parish，1984）退却后，邓小平和他的后继者的改革重构了中国的阶层结构，并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长（Riskin，Zhao & Li，2001）。据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2002）所进行的最近最全面的研究，从公众意识和收入水平而言，在21世纪的头一年，中国社会存在十个阶层：国家干部、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家处于顶层；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处于中间；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处于底层。本论文并非旨在评估所有这些社会阶层和他们的相对收入，而是关注于一些精英类型——干部、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干部、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是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的旧精英。他们的人生机遇反映了新兴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果这些旧精英维持他们的相对经济地位，那么这将被理解为中国政治稳定的一个原因。换言之，如果干部逐步让位于经理人员，那么可能一个“公司中国”（corporate China）正在形成中。还有第三种推测，就是干部和经理人员都相对失落于专业技术人员，因为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对专业技术人力资本的报酬超过了对政治和管理资源的报酬。限于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分析，我们未能含纳私营企业主，他们是正在发展扩张的“新”精英群体，目前在中国城市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①

本篇论文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将回顾关于中国精英的社会学模型。其次，对于市场化改革如何引起精英之间收入差异变化，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我们将对此进行评议。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分析1988年和1995年进行的两次全国性和可比性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检验这些不同的解释。在结论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对未来的中国精英研究提出建议。

① 1988年和1995年的中国居民收入调查中，包含了有关小业主的数据，但未包括那些可观的私营企业主。由于受限于数据，我们无法对企业家的经济地位与政治精英、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的比较进行针对性的论述。本文中对后面那些群体的比较，有助于应对魏昂德（1995）首先在他的双重精英模型中提出的相关事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精英的社会学模型

摇摇二元精英模型

泽林尼（1978：63－87；1983）开创了“社会主义再分配精英”研究，指出了国家社会主义中阶层结构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官员控制公共资产，并据此分配经济剩余。在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的专业技术人员被认为处在“正在转向”这一阶级权力的过程中（Konrad & Szelényi，1979），而直到8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并未在中国发生（Walder，1995：309－328）。魏昂德发现，中国的行政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保持不同的社会流动路径，导向不同的职业。一条职业路径是，受教育程度高者通向职业声望高的专业职位。另一职业路径是，受教育程度高、又有中国共产党员身份的人通向职业声望及物质报酬皆佳的行政管理岗位。换言之，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未获得行政管理者所能够得到的那些特权。后来，对一项调查数据的事件史分析表明这种“二元精英模型”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邓小平的面向市场的改革也使之变化甚微（Walder，et al.，2000：191－209）。

二元精英模型引发了关于政治体制和政治过程的深入研究，在这样的体制和过程中，以党员身份为基础的政治忠诚、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获得了不同的收益（Zhou，Tuma & Moen，1996：440－468，1997：339－365；Bian，Shu & Logan，2001：805－841；Li & Walder，2001：1371－1408；Zang，200：62－75）。市场改革使得人力资本物质回报的增长超过了政治忠诚物质回报的增长，从而使政治官员在“市场转型”中逐渐落后于专业精英（Nee，1989：663－681，1996：908－949），这一论断是否成立还有待分晓。迄今为止，实证发现是混杂的（Nee & Matthew，1996：401－435；Nee & Cao，1999：799－834；Cao & Nee，2000：1175－1188；Zhou，2000：339－365），不过，大多数以前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将行政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放在一起比较，而是将体力劳动者作为参照群体。本文将着重于比较从1988～1995年行政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差异。

摇摇异质干部精英模型

同质干部精英模型假定，干部权力的来源是统一而又稳固的——党领

导下的政府完全控制国家经济——尽管有市场改革。诚然，在毛泽东时代基层干部由统一的人事制度组织起来，包括职位任命、提升和物质利益分配（Davis，2000：251－275）。然而，这一制度已经被邓小平的改革削弱了许多，新兴的市场体系为职业成功和经济富足提供了一条不同的道路（Nee & Lian，1994：253－296）。在党政分家的指令下，从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官员和管理干部开始在各自的权限下履行不同的职责，行使不同的权力。因此，在政府机构中，党的干部和国家干部由于不同的权力来源，开始呈现出不同的个体特征，得到不同水平的报酬（Zang，2001：62－75）。在改革后，在干部精英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企业管理者不再拥有终身聘用的保障；在竞争不断加剧的经济情况下，他们的职位和报酬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工作表现，而不是他们的政治忠诚（Naughton，1995）。

倪志伟和曹阳（Victor Nee & Cao Yang，1999：807）认为，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中，“管理精英必须在市场中争取权力和利益，市场中的相对优势以人力资本为基础，如通过正规教育和工作资历获得能力”。在他们最近关于1995年中国居民户收入调查的分析中，倪志伟和曹阳（2002）提出，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已经分化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干部”指的是党和政府的官员，就像改革前的“再分配精英”，这个群体的权力和特权主要来自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等级制度。第二种，管理官员，指的是事业单位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存在于他们掌控中的公共资产。第三种，“经营者”，这是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主要与他们的管理经验和企业赢利状况有关。倪和曹发现，不同的干部精英的个体特征并无明显差异，但是他们的个体特征却与那些专业精英有着显著的差异：在干部精英的群体中，党员身份与个人职位的关系要比专业精英群体中更加明显。换言之，晋升到一个政治、行政或管理干部的岗位时，政治忠诚度和政治资本的重要性要比得到一个专业技术岗位时大得多。这一点证实了早先的一个城市个案研究的发现（Bian，et al.，2001：805－841）。三种干部精英群体的分类为研究多种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之间的收入差异提供了前提。尚未有人提供这方面的分析，而现在本文旨在实现这一目标。

摇摇以部门为制度环境模型：一种新视角

我们认为精英的权力和特权要视这些精英所在的经济部门而定。面对市场制度的成长，邓小平和后邓小平体制通过对具有战略性重要意义的行业实行垄断控制来自觉地维护权力基础。尽管这些旧精英可能在开放的竞

争性部门中败给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但他们在这些垄断行业中仍然获得收益。基本上，经济部门已经成为制度环境，这为组织建构了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机遇，给各类精英行使权力、保持特权设定了结构性限制。

1992 年后的改革导致的重大变化是国民经济的重组和分化，这主要是市场化和国家转型互动的结果（Bian & Zhang，2002：375－413）。过去由国家垄断的城市产业在改革后分化为两个领域：开放、竞争部门，允许非国有企业准入；封闭、垄断部门，限于国有企事业单位。前一个领域包括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后一个领域包含的产业对国民经济而言具有战略性意义，提供全国性产品和服务（如电信业），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如银行业），或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教育行业和大众传媒业）。

这两个领域在不同的规则下运作，垄断和竞争决定了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如何维系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在开放部门，经营者必须有赖于他们的专长和能力，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其企业产品销售的增长和利润的提高。而垄断部门的经营者则相反，他们主要通过企业的垄断性利润、对国家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以及其在政府规制和新兴市场体系中的寻租能力来保障他们的高收入水平（Lin，2000：608－613）。同样，垄断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益也高于竞争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过这未必是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收益，而是从其所在组织的垄断性利润中得到的分成。由于垄断部门和开放部门间的经济分割改变了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力和收入来源，经济部门应该成为对改革时代的中国精英进行界定和分类的一个因素。

对收入差异的解释

摇摇市场转型论解释（The market transition explanation）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1989；1991；1996）预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导致再分配干部的收入水平与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相比相对下降。这一预言的潜在逻辑是随着市场发展，国家再分配将随之衰落，再分配干部丧失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因此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倪志伟对市场以新古典主义的理念加以理解，他断言，市场尊重效率，回报企业家资质、专业特长和生产性人力资本，排斥行政干预、利益集团、党派忠诚和政治资本。结果是，面向市场的改革将导致再

分配干部在权力和特权方面的相对下降。

倪志伟（2001：846－852）近来提醒我们，在操作“再分配干部”这一概念时需小心谨慎。他认为，在改革时代，并非所有中国传统认识中的干部都符合再分配干部的学术性特征。倪和曹在一篇关于多种干部精英结构的评述（Nee & Cao，2002）中指出，对他们来说只有“党政官员”是再分配干部，而“事业单位管理者”和“经理”并不是再分配干部。在倪和曹看来，改革时代的管理者，尤其是经理们“在市场中工作”，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并不是再分配的。相反，这些精英本身就是生产经济剩余的重要因素，他们不同于党政官员，在剩余物的再分配中不起作用。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保持着混合状态（Parish & Michelson，1996：1042－1059），而且对于精英群体来说，等级体系和市场都可能是权力和特权的来源（Bian & Logan，1996：739－758；Zhou，2000：1135－1174）。就精英们从这种等级体系中获得的权力和特权而言，倪志伟的“官员”、“管理者”和“经理”构成了再分配权力的下降趋势中的变数。

摇摇权力持续论解释

权力持续论观点（Bian & Logan，1996：739－758）预言，在改革期间，再分配干部可能保持比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高的报酬。之所以这样预言，有几点原因。首先，中国长期处于党的领导下，等级和市场可能共存，形成通向繁荣的平行路线（Bian & Logan，1996）。其次，新兴的市场经济可能使那些能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得到好处，而政治市场的运作将去保护那些政党精英和能力略差者的利益（Parish & Michelson，1996）。最后，市场和政治利益彼此相互适应，两者的共同演进成为整个“转型”过程的特征（Zhou，2000）。当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瓦解时，干部权力可能转换至网络资源和生产性资本的私人所有权（Rona－Tas，1994：40－69）。

权力持续论解释激发了学者们对中国复杂的市场化过程进行研究，不过对“再分配权力”这个概念的可靠性设计问题和不充分操作严重阻碍了这一研究。一些研究者把被调查者报告的干部身份作为再分配权力的度量；另有一些研究者采用广义上的“高级”和“低级”干部标签；还有一些研究者将工作头衔按再分配权力的理论概念进行分类。以上这些操作都未能完全符合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中所定义的概念，而这样的概念化需要区分官员和经理之间的差别。通过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我们初步尝试将干部归为不同的类别，并相应地检验市场转型理论的解释和权力持续论的解释。

摇摇“市场—政府”互动论解释

“市场—政府”互动论解释预言，市场改革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要视经济部门中的雇员的收入而定。边燕杰和张展新（2002：375－413）提出了这种观点，以解释在1992年以后的市场改革中，尽管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在增长，但国家垄断部门仍维持着高收入水平。本文中，我们将运用这种观点来说明，在不同部门工作的精英们的收入差异。

边燕杰和张展新（2002：附录B）指出，开放部门就像一个角斗场，自由进入和退出让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处于竞争状态下。这意味着开放部门中的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必须凭借效率和生产力来获得高收入。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认可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和职业专家为报酬进行讨价还价，这取决于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管理能力或职业专长是否处于相对短缺的状况并得到特别优待。

在国家垄断部门中，组织获得“垄断利润”：来自于某些国家垄断行业的收益，以及国家机构和公共组织凭借其调控、干预权力获得的预算外收入。这些垄断利润不受市场竞争的影响，由组织的决策者——党政官员、事业管理者、国家垄断企业的经营者控制，并以各种形式进行收入分配。专业技术人员期望从垄断利润中得到分成，但是可能明显少于官员、管理者和经营者，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分配决策过程之外。随着开放部门的迅猛发展，专业技术人员讨价还价的权力将会不断增加，不过如果工资级差水平不如垄断企业高的话，这种权力可能会受到限制。毕竟垄断企业更容易赚钱，并将这些收益分配给其中的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将在数据分析中再探讨这一实证问题。

区分垄断部门和开放部门的一个明显好处是，这样可以将垄断部门中的官员和事业管理者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作比较。因为对官员和管理者而言，国家垄断和干预是权力的新来源，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资本获得物质财富，进而在改革时代继承了泽林尼所谓“社会主义再分配精英”的传统。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则相反，他们在市场环境中工作，受劳动力市场压力的支配，在工作岗位上通过运用人力资本挣得收入。与垄断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开放部门中的经营者相比，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可能更受市场驱动。这样，如果市场转型理论的预言成立，官员或事业管理者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应当经历收入水平上的相对下降。如果权力持续论解释是可信的话，官员和事业管理者与开放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相比，他们的收入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数据和变量

我们对 1988 年和 1995 年中国城市居民调查的数据进行趋势分析（Griffin & Zhao，1992；Khan & Riskin，1998；Riskin，Zhao & Li，2001），焦点是政治精英、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化。如果数据来自更早的年份，比方说 1980 年，将会考虑做一个“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比较；不过 1988 年到 1995 年的八年间，市场体系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因此，我们对 1988 年和 1995 年中国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分析考察了 1992 年以后市场体系的扩张和发展对中国城市收入分配模式的重构程度。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由一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设计并实施，该调查分为中国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而本文使用的是城市样本。抽样以国家统计局每年全国性居民经济状况调查的框架为基础。尽管这个框架包括了所有 31 个省级单位，不过 1988 年的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样本包括的是中国首都北京和 9 个省份——安徽、甘肃、广东、河南、湖北、江苏、辽宁、山西和云南；1995 年的样本增加了四川，而且由于资金限制，在该年份减少了抽样数。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家进行了很多研究的上海市和天津市未包括在其中。不过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中的 11 个省份涵盖了改革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区域（Riskin，Zhao & Li，2001）。在每一个较低的层面（城市、区、街道和家庭），首先根据平均收入来划定抽样单位，然后按照一个固定的间隔用系统抽样法抽出每个单位。每个被抽中家庭的所有工资收入者的信息被收集起来。

出于本文的需要，我们仅从中国城市居民调查中选取了干部、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来说，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为 18～69 岁，在调查的时间段内他们自报的工作是国家和城市集体单位中的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中的技术人员、职员和所有其他被访者均未包括在其中。我们从 1988 年和 1995 年的中国城市住户调查中分别找到 3678 个和 3896 个工资收入者，他们要么是管理人员，要么是专业技术人员，要么两者皆是。当一位专业人士（比如一名医生或教授）担负有行政职务（比如主管他/她所在的部门），并在调查中这样讲述，我们将他/她视为管理人员，而不是归为专业技术人员。我们采用 OLS（最小平方法）模型，对从事不同精英工作类型的调查对象进行收入差异的估计。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模型估计总收入的差异，也可以估计其他变量对净收入差异的影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的收入变量是每个调查对象从事第一职业所获得的全年现金收入。从第二和第三职业获得的收入未考虑在内，因为几乎没有调查对象会自愿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我们还未将非劳动收入包括在内，比如利息、红利和现金馈赠。尽管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中收集了有关实物收入的信息，不过这方面的报告不足。在 OLS 模型中，将收入转换成对数形式，这将收入差异转变为百分比差异。

我们对精英的分类是基于调查对象填报的有报酬的工作。按照前面讨论的理论模型，要进行多种检验，因此我们定义了一些变量。假设城市精英是同质精英，干部为二分变量，官员、事业管理者和经理都被归为干部（=1），而专业技术人员为非干部（=0）。假设城市精英是异质精英，与倪和曹（2002）的观点一致，把以前的干部概念分解为三个亚类：（1）官员，包括在党政机关或群众组织（实际上是政治组织）中领导岗位工作的人；（2）管理者，包括事业单位领导和其他管理人员；（3）经理，包括在国有企业或城市集体企业中担负管理职责的人。为了满足部门—精英互动模型的要求，我们按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垄断部门还是在竞争部门，进一步将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类。竞争部门并不包括官员和事业管理者，因为按照定义，他们的组织机构属于垄断部门。

为了估计精英的结构性特征和个人特征对净收入差异的影响，我们在 OLS 模型中加入了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年龄是调查对象在调查的那个年份自报的，据此换算出年龄平方变量，以在 OLS 模型中估计年龄对收入的可能的非线性影响。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分为五个测量水平：小学或更低、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大学或更高。性别（男性 =1）和党员身份（党员 =1）为虚拟变量。调查对象的工作场所被划分为三类：中央国有、地方国有、地方集体企业。最后，定义了一组样本省份虚拟变量，以控制收入的地区性差异。

结果和解释

摇摇精英个体特征的稳定性与变化

与倪和曹一样（2002），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干部精英在个体特征上没有显著差别（官员、事业管理者和经理）。因此，表 1 中将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的个体特征分列两边。在每个年份，Z 值标志着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之间在每个相关变量上的平均差异的统计显著水平。大部分平均差异

是显著的，这说明中国城市中的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来自人口中的不同群组。他们的差别主要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上，不过他们相当平均地分布在在不同行政级别和工作场所上。通常，干部精英与专业精英相比，更可能是男性、年长、教育程度不高、拥有党员身份。

表 1摇精英个体特征：平均数和平均差异
（1988 年和 1995 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

	1988			1995		
个体特征变量	干部精英	专业精英	Z 值	干部精英	专业精英	Z 值
性别（男性 = 1）	0. 851	0. 524	-22. 274	0. 765	0. 513	-16. 576
年龄	46. 544	41. 213	-16. 626	47. 746	42. 773	-14. 270
年龄平方	2234. 9	1796. 9	-15. 494	2378. 4	1951. 9	-13. 026
小学或更低	0. 063	0. 024	-4. 826	0. 027	0. 009	-3. 616
初中	0. 271	0. 116	-10. 287	0. 195	0. 099	-7. 762
高中	0. 199	0. 140	-4. 239	0. 174	0. 127	-3. 863
职业学校	0. 162	0. 277	8. 032	0. 187	0. 280	6. 699
大学或更高	0. 303	0. 439	7. 903	0. 417	0. 485	4. 037
党员身份（党员 = 1）	0. 810	0. 341	-30. 812	0. 743	0. 289	-30. 448
高级别国有单位	0. 504	0. 514	0. 525	0. 341	0. 359	1. 086
地方国有单位	0. 404	0. 420	0. 876	0. 579	0. 572	-0. 412
城市集体企业	0. 092	0. 066	-2. 498	0. 080	0. 069	-1. 183
个案数	1049	2629		1345	2551	

摇摇关于精英分布的说明：

1988 年：1049 名干部精英中，29. 9% 是官员，13. 8% 是事业管理者，56. 2% 是经理（12. 2% 在垄断部门，44. 0% 在开放部门）。2629 名专业精英中，64. 4% 在垄断部门，35. 6% 在开放部门。

1995 年：1345 名干部精英中，30. 1% 是官员，15. 8% 是事业管理者，54. 2% 是经理（10. 0% 在垄断部门，44. 2% 在开放部门）。2551 名专业精英中，54. 2% 在垄断部门，45. 8% 在开放部门。

在 1988 ~ 1995 年间，个体特征发生了变化，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的变化最显著。在 1988 年，30% 多一点的干部达到了大学或大学以上的教育程度，但大约有 44% 的专业技术人员已经达到了这种水平。在 1995 年，受过大学教育的干部增加到 42%，比例增速超过了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增速（49%），两者之间原本 14% 的差距减少了一半，大约只剩 7%。我们尚不清楚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①] 关于党员身份，在 1988 年

①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干部在党校中接受大学教育，这种模式在年轻党员中很常见（Li & Walder, 2001）。也可能是因为吸收大学毕业生进入干部队伍的新政策导致了这一变化（Lee, 1991）。还有第三种可能，由于 1992 年后的改革号召“专家”担负管理职责，数目庞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了干部（Naughton, 1995）。可惜的是，无法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的数据来探究以上这些原因。

81%的干部和34%多一点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党员，在1995年47%的差距基本上维持不变，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都有了下降（干部中有74.3%，专业技术人员中有28.9%）。这种下降可能是由于吸收新党员的力度有所降低，或者只是因为近些年来的入党申请者要少于前些年。与这些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在增加，这意味着在中国城市中党员身份的作用在削弱，而教育文凭的作用在提升。

摇摇总收入差异

在表2中，OLS模型的结果是在不引入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精英间收入差异的估计。我们从二元精英模型开始。在1988年和1995年，干部精英的收入基本上高于专业精英，大致分别高出12%（e. 110）和9%（e. 085）。从1988～1995年，这种收入差异有所下降，但这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这表明，如果假定同质干部的精英模式，从1988～1995年干部的权力和特权与专业精英相比并未削弱；相反，他们基本上保持了相对收入优势，1992年以来的改革之后依然是这样。

异质干部精英模型将干部精英分解为官员、管理者和经理。将专业精英作为一般参照群体，这种模型体现出在1988年和1995年，官员和管理者的收入明显高于专业精英。尽管到了1995年，这种差距拉大了，不过其统计意义并不显著。从另一方面看，在这两个年份中，经理的收入也明显高于专业精英，但是在1995年经理的收入优势明显降低；差异水平从1988年的13%（e. 125）降低到1995年的5%（e. 048）。按照倪和曹的观点（2002），改革时代的官员和管理者与经理相比，前者更具再分配精英的属性。因此，从异质干部精英得到的结论并不支持这种假设：市场的发展导致了再分配精英在收入水平上的相对降低。这一结论表明，从1988～1995年，经理人员而不是其他干部精英，其收入水平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确有下降。

以部门为制度环境模型，以开放部门中的专业精英（受市场驱动的专业技术人员）为参照群体，如果市场转型理论成立，而且中国1992年后的改革成功地创建了市场体制，那么从1988～1995年，官员和管理者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精英相比，前者应该在收入水平上相对降低。然而，这一模型揭示出截然相反的状况：在这两个年份中，官员和行政管理者的收入明显高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1995年的差异幅度也明显大于1988年。垄断部门中的经理与开放部门中的经理相比，前者可能看上去拥

有更多的政治权力，而且按照市场转型理论，前者应该遭受收入的相对下降。可是，事实再次相反：在这两个年份中，垄断部门中的经理的收入要高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 1995 年的差异幅度与 1988 年相比，不仅没缩小反而扩大了。形成对照的是，在这两个年份，尽管开放部门中的经理的收入要高于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优势在 1995 年被严重削弱，开放部门中的经理实际上收入相对降低。考虑到开放部门是市场经济，而其中的经理既不是官员也不是事业管理者，这一特定的结果不应当视为支持了再分配权力相对降低假设。相反，在 1988 ~ 1995 年之间，官员和管理者与经理相比，前者的收入持续较高。与此同时，在垄断部门内的经理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持续保持着收入优势。

表 2摇省份控制条件下的精英类别年总收入非标准化 OLS 对数回归系数
摇摇（1988 年和 1995 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

	二元精英模型			异质干部精英模型			以部门为制度环境模型		
	1988	1995	Z	1988	1995	Z	1988	1995	Z
精英类别									
干部	0. 110***	0. 085***							
官员				0. 073***	0. 106***		0. 076***	0. 159***	>
事业管理者				0. 128***	0. 174***		0. 132***	0. 227***	>
经理				0. 125***	0. 048***	<			
摇垄断部门							0. 126***	0. 211***	>
摇开放部门							0. 130***	0. 076***	<
专业技术人员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摇垄断部门							0. 005	0. 096***	>
摇开放部门							省略	省略	
各省虚拟变量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常量	7. 682***	9. 062***		7. 681***	9. 058***		7. 677***	9. 002***	
方程确定系数	0. 181**摇摇**	0. 212**摇摇**		0. 183**摇摇**	0. 216**摇摇**		0. 183**摇摇**	0. 226**摇摇**	
个案数	3678**摇**	3896**摇**		3678**摇**	3896**摇**		3678**摇**	3896**摇**	

摇摇检验水平：* p < 0. 05，** **摇**p < 0. 01，*** **摇**p < 0. 001（双尾检验）。

Z 检验结果：“>”表示 1995 年回归系数大于 1988 年回归系数；“<”表示 1995 年回归系数小于 1988 年回归系数。

垄断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之间有一个有趣的比较。1988 年，这两个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差不多（统计意义不显著的回归系数 . 005）。1995 年，市场体制在开放部门中变得强有力时，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低于垄断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差幅达到了 10% （e. 096）。由此可见，市场竞争并没有提高开放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能力。自从 1992 年的改革以后，垄断部门中的

官员、管理者、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与开放部门中的经理、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前者的得益似乎反而更加明显。

摇摇净收入差异

因为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的个体特征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诸多方面存在不同，所以他们的收入差异可能要归因于这些因素。表3显示了OLS模型的结果，其中包含了这些变量和其他个体特征变量作为统计控制。

二元精英模型体现出，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之间收入差异的多少，的确归因于他们的个体特征。当模型中包括个体特征变量时，干部精英和专业精英在收入差异上不仅量值变小，而且在统计学上的意义不大。性别、年龄和党员身份对收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变量的作用是有利于干部群体的，对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则不是。教育程度具有正作用；教育程度越高，获得的收入越高。因为作为一个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程度要高于干部群体，教育程度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提高作用要大于干部。但是这种作用差别的意义正在减弱，原因是，如表1所见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教育程度的（尤其在大学教育方面）差距正迅速缩小。总体看来，1988年和1995年，干部精英与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前者都保持着收入方面的优势，这既是因为他们的干部权力，也是因为他们有利的个体特征。

异质干部精英模型在大体上确认了以上关于干部精英对专业精英持续处于优势地位的结论，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些有意思的发现。首先，官员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优势完全归因于他们的有利的个体特征；如果模型中不包含个体特征变量的话，1988年和1995年的收入差异几乎就不存在了。其次，事业管理者的收入优势主要归因于他们的有利的个体特征，他们的优势只是在1995年得到了加强。第三，在1988年和1995年，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前者的总收入处于中等优势（表2），但是他们在净收入上的优势在1995年却完全丧失（表3），这使得他们经历了相对的下降。

正如以部门为制度环境模型所展示的那样，在1995年，在垄断部门工作的官员、事业管理者、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对开放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都保持了收入优势。此外，从1988～1995年，与他们在垄断部门对应的从业人员相比，开放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在收入水平上相对降低。最后，官员和事业管理者，或是改革时代的再分配精英，在这两个年份中，对垄断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收入上都占有优势，不过这些优势

在长时间内还不会改变，这主要是归因于他们拥有更加有利的个体特征。

表 3摇省份控制条件下的精英类别和精英个体特征的年总收入非标准化 OLS 摇摇对数回归系数（1988 年和 1995 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调查）

	二元精英模型			异质干部精英模型			以部门为制度环境模型		
	1988	1995	Z	1988	1995	Z	1988	1995	Z
精英类别									
干部	0.013	0.014							
官员				−0.037*	0.021	>	−0.040*	0.065**	>
事业管理者				−0.004	0.063*	>	−0.007	0.108***	>
经理				0.045**	−0.004	<			
摇在垄断部门							−0.025	0.153***	>
摇在开放部门							0.047**	0.010	
专业技术人员	省略	省略		省略	省略				
摇在垄断部门							−0.005	0.084***	>
摇在开放部门							省略	省略	
精英个体特征									
性别（男性=1）	0.072***	0.050***		0.070***	0.052***		0.070***	0.059***	
年龄	0.062***	0.058***		0.061***	0.058***		0.061***	0.059***	
年龄平方	−0.001***摇	−0.001***摇		−0.001***摇	−0.001***摇		−0.001***摇	−0.001***摇	
小学或更低[a]	−0.038	−0.115*		−0.039	−0.113*		−0.038	−0.122*	
高中[a]	0.006	0.067**	>	0.011	0.066**	>	−0.011	0.064**	>
职业学校[a]	0.022	0.074***	>	0.026+	0.071***	>	0.026+	0.064**	
大学或更高[a]	0.085***	0.148***	>	0.089***	0.144***	>	0.090***	0.134***	>
党员身份（党员=1）	0.047***	0.064***		0.049***	0.063***		0.049***	0.065***	
中央国有单位工作[b]	0.087***	0.242***	>	0.097***	0.237***	>	0.099***	0.219***	>
地方国有单位工作[b]	0.036*	0.141***	>	0.046**	0.137***	>	0.048**	0.120***	>
各省虚拟变量	（未列出）			（未列出）			（未列出）		
常量	6.025***	7.334		6.024***	7.337***		6.026***	7.295***	
方程确定系数	0.435	0.332		0.438	0.333		0.438	0.342	

摇摇检验水平：+p<.10，*摇p<0.05，**摇p<0.01，***摇p<0.001（双尾检验）。

Z 检验结果：“>”表示 1995 年回归系数大于 1988 年回归系数；“<”表示 1995 年回归系数小于 1988 年回归系数。

被省略的参照类别：a=初中；b=城市集体企业。所有模型的个案数是：1988 年是 3678 个，1995 年是 3896 个。

摇摇结论和讨论

许多关于中国 1980 年后社会分层系统的研究已经对市场改革期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